

中國小說批評方法的近代化

王海天

內容摘要：晚清小說批評方法的現代化既是晚清小說理論現代化的一個方面，又是其近代化的一個重要條件。中國小說批評方法的近代化表現在晚清小說批評觀的近代化；晚清小說批評的專門化、形式的多樣化及初趨系統化；晚清小說批評理論的更新；晚清比較研究方法的廣泛運用和拓展。

關鍵詞：中國小說；批評方法；近代化

作者簡介：王海天，男，1964年出生，河南廣播電視大學講師。鄭州：450008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Fiction Critical Criticism

WANG Haitian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Late Qing Dynasty fiction criticism is an aspec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fiction critical theory during that period, 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condition of its formatio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way to comment on Chinese fiction display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following features: its critical criticism modernization; its specialization, variety and pro-systematic characteristics; its renewal of critical theory; its wide us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rative study method.

Key words: Chinese fiction; criticism; modernization

Author: WANG Haitian, male, born in 1964. Lecturer of Henan Radio & TV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8.

在我國晚清以前，相對於詩文批評來說，小說批評很少受到文藝家們的青睞且自身的發展也處於不足狀態。一方面歷來人們對小說及小說理論較輕視；另一方面就小說理論本身來說，其零散的形式和單一的批評方法，不能不說是我國古代小說理論長期不能發達的一個原因。小說理論在晚清的空前豐富和發達，很大程度上得力於晚清小說理論家們對小說批評方法的革新。晚清小說批評方法的近代化既是晚清小說理論近代化的一個方面，又是其近代化的一個重要條件：

晚清小說批評方法的近代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晚清小說批評觀的近代化

這裏所謂的小說批評觀，主要指理論家將小說看成一種什麼性質的東西進行批評，以及他們對小說理論本身的認識等。

關於小說作為一種獨立文體的性質，晚清以前人們的認識都比較含混。

“小說”一詞最早見於《莊子·外物篇》：“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小說”只是指瑣屑的言談，小的道理，並非一種文學形式。班固所言：“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之所造”^[1]的“小說”也指那些不見經傳、流傳於民間、內容怪誕淺薄的奇事異聞乃至傳說的東西及其他雜著，跟我們今天所說的小說相差甚遠。明胡應麟應該算是理論家中對小說認識比較深刻的，但他把小說概括為：“小說，子書流也。然談說理道。或近於經，又有類注疏者。其述事迹，或通於史，又有類志傳者。”^[2]可見他也並未能把小說從野乘雜著中分離出來，沒有真正認識到小說作為一種文體的獨立性。即便到了清代，紀昀仍然存在着認為小說畢竟只是“小說”，並無大益而時有害處的陳腐觀念。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他曾多次流露出這種看法，他說：“其間雖多俳優詼諧之詞，然惟金華士人著命司諸條，不出小說習氣。為自穢其書耳。”^[3]又說：“南岳夫人一事，尤為猥褻，亦未免墮小說窠臼自穢其書。”^[4]其鄙視小說之意溢於言表。蒲鬆齡自稱“雅愛搜神”、“喜人談鬼”却在《聊齋自志》中感嘆：“集腋成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託如此，亦足悲矣！”骨子裏存在着一種以作小說成為寄託的強烈自悲感。金聖嘆大力稱道《水滸》為天下一流文章，但也沒能完全視小說為一種具有獨立意義的文學形式。他也曾用妥協的語氣說過：“《水滸傳》到底是小說。”當然，必須承認晚清以前的小說理論家確乎對小說的性質和藝術規律等作了許多可貴的探索。但是，他們評論小說時，到底沒能明確樹立起小說為真正文學意義上的獨立存在形式的觀念，這一點是不可迴避的事實。

同樣，他們對小說理論本身的認識也是比較膚淺的。胡應麟主要注意到了其理論在目錄學上的意義。他頂多會為那精細的分類感到陶醉。金聖嘆、張竹坡們也不過試圖通過評點教會少年子弟們一些作文之法，對社會釋放些“懲惡勸善”的能量。當然，他們的小說理論本身所產生的影響和作用遠比他們自己所意識的要大的多，特別是其理論在肯定小說的功能及探討小說的藝術方面，為後代理論和創作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奠基作用。我們只想強調一個方面：即晚清以前的小說理論家對他們自己創造的小說理論在促進小說創作、欣賞及對其他一些社會領域的影響方面的真正意義還沒有明確的認識，他們還沒達到有意識地為小說創作、為小說之影響社會搖旗吶喊的境界。

總而言之，近代以前的小說理論家們在其批評過程中，既沒有真切地認清小說獨立的文體意義，也沒明確其小說批評本身的意義。這兩者都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們的思考深度和廣度，阻礙了小說理論的發展。

到了近代，小說理論家明確了小說的概念。他們喊出“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這一口號是植根於對小說作為一種獨立文體有了清晰認識之上的，與李贄之稱小說為“古今至文”有本質的區別。他們不僅將小說作了真正文學意義上的肯定，而且把小說從經、史、詩文中劃分出來，使它成為與詩文並列的一種獨立的文學樣式。楚卿就着意探討過小說與詩詞等文學體裁的區別，他說：“文學之中，詩詞等韻文最以蓄為貴者也。然真能解詩詞之趣味者能有幾人？小說與詩詞正成反比例者也。……有敘述累萬言而似含蓄不盡者，亦有點逗僅一二語而已發泄無遺者。泄之為用，如扁鵲所謂：見垣一方人，洞悉五臟癥結，如溫渚然犀、魍魎魑魅、無復遁形，而比本惟小說家最占優之。小說者，社會之X光綫也。”^[5]晚清小說理論家對小說在獨立的文學和獨特的文體意義上的確定，即對小說本體的認識，不僅是對古代小說理論的發展和提高，而且為他們的理論確立了一個明晰的、準確的、具有科學性的批評對象。使批評能更專注於小說，專注於小說文體本身，這就加速了小說理論的發展。

在對小說批評本身意義的認識上，近代理論家也達到了相當的高度，是以前的小說理論家不可比較的。

新小說報社所發的《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一文就明確指出：“本報論說，專屬於小說之

範圍，大指欲為中國說部創一新境界，如論文學上小說之價值，社會上小說之勢力，東西各國小說學進化之歷史及小說家之功德，中國小說界革命之必要及其方法等。”這種看法可以代表當時小說理論家們對批評的認識。如樸啓超倡小說能發揮重大社會作用的原因等。徐念慈批評小說，意在發現小說在美學上的價值，探討小說的美感。天謬生作《中國歷史小說史論》與《中國之大家小說論贊》、孫毓修作《英國十七世紀間之小說家》、周作人寫《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等等，則着眼於考察中外小說發展的歷史，品評中外歷代小說家之功德，力圖從中總結出小說發展的一些規律。呂思勉《小說叢話》更是自覺地對小說理論進行總結，努力建立較完整的小說理論體系了。所有這些都足以說明，晚清小說理論家已經有了較明確的批評目的，已經達到了小說批評的自覺階段，具備了較科學的批評觀念。在這種觀念的指導下，小說理論家不僅可以擴展小說批評的範圍，增進小說批評的深度，而且能夠注意於小說批評的系統化，以促進小說創作和理論本身的繁榮，在更高的意義上發揮出小說批評的能量。

晚清小說批評觀的近代化，是小說批評方法近代化的一個基本而重要的方面。雖然它表面上並非小說批評的某種實在的方法，但批評觀的革命却具有更高的方法論意義上的價值，它是批評方法革新的觀念基礎。因此我們把作為批評方法近代化的第一點來論述。

二 晚清小說批評的專門化、形式的多樣化及初趨系統化

晚清小說理論在充分繼承了歷代小說理論形式的同時，已經大大突破了舊的批評形式，因而在小說批評的形式上，呈現出豐富多彩、各擅其長的繁榮局面。跟中國傳統的小說批評家一樣，他們中一些人依舊採用了序跋、評語、隨感等形式，不過這種傳統的形式更多地被專題性的專論和報刊叙啓及小說評論隨筆所取代。他們利用頗有新意的“小說叢話”和“發刊詞”等形式進行小說評論。最重要的是他們那些單篇的專論小說的論文，這種論文形式完全不同於前代的批評形式，它們都是有意識地針對小說理論的某一問題進行探討的長短不一的專論，有的文章甚至試圖系統闡明小說的基本性質和具體特徵，建立完整的小說理論體系。這些隨感式的序跋形式與條理化的論文形式并存，並未使小說理論顯得雜亂無章，而恰恰是這種批評形式的多樣化，可以使我們的理論顧及到小說性質的各個層面和細部，獲得批評的全面性。

當然，這種全面性是以深刻性為基礎的。晚清小說批評的專門化和初趨系統化便足以代表其理論的深化。晚清以前，由於小說本身地位的低下，人們對它的認識和重視不夠，以致歷代理論家都沒有論述小說的專著或專門文章。我們現在看來，那些內容偏重於對小說故事、作者佚事考證或形式顯得零散的序跋、評點、筆記等，只能作為小說理論的補充；而真正科學的小說理論則應該是專門性的論文或論著。

晚清小說批評界正是獲得了這種批評的科學性，出現了大量的質量達到了一個空前高度的小說專論。單看樸啓超等人的《小說叢話》，雖然帶有筆記體的特點，但已經是一種嶄新的專題性的小說文藝隨筆集了，遠非昔日那種無所不談、內容蕪雜的野史筆記可比。天謬生的《中國歷代小說史論》已從文學發展史的角度，對我國小說發展的歷史進程進行考察研究，還從作者的創作動機和當時的社會狀況等方面闡述我國古代小說的價值。樸啓超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是從小說與社會政治的角度加以論述的小說專論；夏曾佑的《小說原理》比較透徹地論述了小說的形象直觀及高於生活的藝術特點，從心理學上分析了人們喜讀小說的原因，並指出作小說的五難五易，強調了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影響也是最大的。晚清小說理論幾乎涉及到了現代意義上的小說藝術規律的各個層面。總體來看，其理論已經達到了一定程度的系統化。

我們所說的晚清小說理論的系統化，並不僅僅指晚清整個的小說理論在對小說藝術規律探討方面呈現出的較完整的體系性，而且還指當時一些着意於總結小說研究成果，對小說藝術的各個方面進行全面論述，試圖建立完整的“小說學”的論文的出現。如管達如的《說小說》就將晚清的一些主要小說觀點條理化，用較多的篇幅闡述了小說的基本性質和具體特徵，並將小說從文學上、體制上、性質上進行了分類和比較，顯得頗有系統性。又如呂思勉的《小說叢話》運用西方美學觀點，肯定小說是一種“美的製作”。它是近代最長的一篇小說論文，分析了小說興盛的原因、小說與社會的關係、小說創作的的主要方法和譯本小說等多方面問題，論述了從理論上進行“抽象的分類”和從題材上進行“具體的分類”。此文可以看成是一本短小的“小說原理”專著。所以我們可以說，晚清小說理論，不管從總體還是從一些單篇論文來看，它們在小說的地位、特徵、發展的外部規律、創作的藝術規律、發展的歷史進程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上，都有了較系統的見解和主張，並以其豐富的內容和集中的論述，構成了小說批評理論的初步體系。

晚清小說批評的多樣化、專門化和系統化，是小說批評在方法上超出前代的一個方面，是方法近代化的又一表現。它使小說真正成了人們的關注對象，使晚清的小說理論得以在更先進的形式上深入探討，既標誌着晚清小說理論的繁榮和成熟，也推動着理論本身的發展。

三 晚清小說批評理論的更新

小說批評理論，指批評家用以評論小說作品思想和藝術的理論，是他們藉以觀照小說的哲學的、倫理的或科學的理論，是評論作品的根基和出發點。

晚清以前的小說理論家們藉以指導批評小說的批評理論受到了封建美學觀的極大束縛。他們大體上把“文以載道”作為基本的理論指導，以小說“懲惡勸善”功能的大小來評判其高下，而他們所理解的“道”、“善”、“惡”，普遍具有較濃厚的封建色彩，無非是“仁義禮智”、“忠孝節烈”、“善惡果報”之類。他們生活的時代，所處的社會環境不可能給予他們超前的批評理論，加上小說本身的地位在封建時代的低下，使他們的小說理論在所憑藉的批評理論方面顯得呆板和單薄。且不說一般的理論家不可能擁有那些只有近代社會纔可能具備的批評理論，就連一些卓有見識的小說批評大家也未能掌握先進的批評理論作為其批評的指導。金聖嘆對小說有超出時人的認識，他可以直覺地感受且發掘出小說對讀者的美感作用和小說自身所特有的一些藝術特性，但他沒能具有一種先進的、可以全面系統地對小說藝術進行探討的批評理論。這使他的理論顯得零碎，顯得缺乏作為支柱的理論核心。故而始終給人一種不足感。李贄發明“童心說”，在理論中力倡人之“真情”、“至情”，反對封建理學對人性的束縛，頗有點人性論的味道。他一反傳統，高度地贊美梁山英雄，但仍擺脫不了“忠義”和“招安報國”等封建主義範疇。跟近代理論家相比，他的這種人性論還是比較膚淺和不徹底的，但在當時已屬難能可貴，稀少如鳳毛麟角。

時代的急劇變遷，西方美學理論的傳入，使近代的小說理論家獲得了豐富而先進的藉以評論小說的批評理論。他們突破了過去的評論思想，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跟封建性的價值尺度有了本質的區別。他們把西方那些哲學的、倫理的或科學的理論運用到小說批評中，必然使近代小說理論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新面貌。

王國維接受了西方文藝思想中的一種傳統，深受康德、叔本華等人哲學和美學思想的熏陶。他的《紅樓夢評論》一文，以叔本華的思想為指導，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雖屬唯心主義範疇，但和前代相比，却不能不承認它擁有了一種全新批評尺度，並使其顯示出迥異於昔日小說理論的新色彩。它着眼於整個文藝及人生，論及文學的理論、美學、倫理學、哲學等多個層面，開闢出一片小說理論的

新天地。他據叔本華“唯意志論”之“欲絕滅”、“人生之欲”的觀點，評《紅樓夢》為表現解脫的作品曰：“《紅樓夢》一書，實際此生活此痛苦之由於自造，又示其解脫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他又從康德那裏直接繼承了一種非功利主義美學觀。康德認為：“（美的）鑒賞是憑藉完全無利害觀念的快感和不快感對某一對象或其表現方式的一種判斷力。”^[6]王國維以叔本華悲觀主義的人生觀為出發點來運用這種非功利主義美學。他論《紅樓夢》的美學價值，推及整個藝術（他稱之為“美術”）道：“吾人知識與實踐之二方面，無往不與生活之欲相關係，即與苦痛相關係。滋有一物焉，使吾人越然於利害之外，而忘物與我之關係。……然則，非美術和足以當之乎？”又說：“美術之為物，欲者不觀，觀者不欲；而藝術之美所以優於自然之美者，全存於使人易忘物我之關係也。”

徐念慈依據黑格爾和邱希孟等人的美學觀點，認為小說為“合理想美學、感情美學而居其上最上乘者”^[7]。試圖用他們的美學理論來對小說藝術特徵進行比較系統的探討。他指出了小說的形象性、具體性、理想化，討論了小說藝術創造的典型性和美感作用等問題。黃摩西的小說理論也明顯地受了西方資產階級美學理論的影響，他認為：“小說者，文學之傾於美的方面之一種也。”還批評當時小說創作中片面強調社會宣傳作用的現象道：“一小說也，而號於人曰：吾不屑屑為美，一秉立誠明善之宗旨？則不過一無價值之講義，不規則之格言而已。”^[8]另外，許多小說理論家都運用了進步的資產階級人性論和進化論觀點來批評小說。嚴復等人之強調小說描寫人類的“公性情”；俠人之贊美《紅樓夢》描寫人性；樑啟超之論述小說發展歷程；羅普之分析中國小說發展歷史及黃人之據進化的歷史觀而言：“人心與世運進化同途，寧有社會之萬事皆進而文學獨衰退者？”^[9]等等。

總之，由於西方文化大量輸入中土，我國近代小說理論家們多半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他們中許多人接受了西方進步的美學、哲學及倫理思想，並把康德、叔本華、黑格爾、達爾文等人的理論運用於小說批評中。在這些美學理論的指導下，他們可以更深入地對小說的思想和藝術特性進行探討，能站在更高的理論層次上對小說藝術進行批評。當然這些西方理論本身並不完美，而且他們在運用這些理論評論小說時也還存在着一些缺陷和錯誤；但我們至少可以肯定，他們對這些理論的引進和使用，是我國小說批評理論的一個拓展和更新。這種拓展和更新，開闢了我國自己小說理論批評的新層次，也是晚清小說批評方法近代化的標誌之一。

四 晚清比較研究方法的廣泛運用和拓展

在我國古代小說批評中，比較方法也有被運用的，但往往限於一部作品與另一部作品的比較，而在這種具體作品的比較中，又更多地使用了將小說與經籍、史書進行比較的方法。原因在於：一方面我國的敘事藝術是由古史發展起來的，小說藝術便與史筆有了許多天然的血緣；另一方面小說理論家為提高小說的地位，亦忘不了將小說與經史作比附。他們使用比較方法，其意固然想借此提高小說之地位，但也反映出起史觀對他們的束縛，而且是不自覺的。另外，由於中國長期的鎖國政策，使我國文學與外國文學幾乎停止了交流，所以我國古代的小說家進行的比較研究至多也只能稱為文學的比較研究，而不可能是比較文學的研究。晚清以後，翻譯小說大量涌進我國，與我國的小說進行交匯融合，小說創作界也出現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現象。小說理論界則廣泛地使用了比較研究的方法。理論家們不僅比較本國的作品、文學現象，而且更多地對中外小說在創作手法、文化心理、人物塑造等多方面進行了比較研究，豐富了我國的小說理論，加深了人們對中西小說的理解。

先看晚清小說理論中小說比較研究的情況。在他們的比較研究中，有通過比較來說明兩書之異同、評定小說作品優劣高下的，有通過比較來說明小說創作在取材及藝術手法上對前人的模仿與繼承的，還有通過小說與詞、曲、散文、戲劇、繪畫等藝術形式相比較，評價和說明不同作品在風格、

意境上之異同及其規律的等等。

眷秋就《紅樓夢》和《水滸》的取材、語言、風格、思想內容及結構等多方面進行比較，分別其異同，評價各自的成就。狄平子對《金瓶梅》與《水滸》二書亦從多角度進行比較，準確地指出了《水滸》與《金瓶梅》在風格上的許多不同特色。黃人發掘了《宣和遺事》、《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等幾部著作的承傳關係。

署名“棣”則對小說、戲劇、繪畫進行了分析比較，指出小說筆墨能夠進行細微描摹，能夠畢肖地傳達人情世故，表達廣闊複雜的社會生活等優長處。狄葆賢說明了詩詞與小說在含蓄的表達方面的不同要求。有的理論家還對不同朝代或不同題材的小說進行了比較研究等等。

晚清這些小說的比較研究，通過具體的作家作品的比較，探討了小說發展的源流、創作特色；通過與其他藝術形式的比較，發掘出小說藝術自身的藝術特性；通過評論不同作家的成就和不同作品的優劣，發表了批評家的理論主張，總結了小說創作的經驗和教訓，探索出新的創作理論，深化了近代的小說批評理論。

更值得注意的是，晚清由於西方文化的衝擊，小說理論家們已經遠遠不局限於小說的文學比較研究，而開拓了小說比較文學研究的新領域。他們從具體的作家作品、體裁、描寫手法及風俗習慣等多方面，對中外小說進行比較，獲得了許多精闢的見解。

管達如指出了中西小說之短長處，並論及中西互相交流的意義。他說：“譯本小說之善，在能以他國文學之所長，補我國文學之所短。蓋各國民之理想，互有不同；斯其文學，亦互有不同。既有同異，既有短長。”^[10]這也可看做是當時理論家對小說之比較文學研究的意義的認識。

林紓是近代著名的翻譯家，他往往於作品的譯序中對中外作家作品進行比較。他比較《水滸》、《紅樓夢》和迭(狄)更斯的作品道：“施耐庵著《水滸》，從史進入手，點染數十人，咸歷落有致。……然猶叙盜俠之事，神姦魁蠹，令人聳懼。若是書特叙家常至瑣至屑無奇之事迹，自不善操筆者為之，且慚慚生人睡魔。而迭更斯乃能化腐朽為神奇……真特筆也。其長篇可以尋譯者，唯一《石頭記》。”^[11]充分認識到了迭更斯作品與《石頭記》的相同風格及與《水滸》的不同特點。在《洪罕女郎傳》跋語中，他又分析司馬遷、韓愈文章之有“伏流”之巧妙，後較之哈葛德的小說曰：“哈氏之文，亦恒有伏綫處，用法頗同於《史記》。”從這些具體作品的比較中，可以發現中西小說中的許多不同特性。

林紓還從總體上將西人小說的內容、風格等方面跟中國小說進行比較：“故西人小說，即奇恣荒渺其中非寓以哲理，即參以閱歷，無苟然之作。西小說之荒渺無稽。至噶利佛極矣，然其言小人國、大人國之風土，亦必兼言其政治之得失。用諷其祖國。此得謂之無關係之出乎？若《封神傳》、《西遊記》者，則真謂之無關係矣。”^[12]許多理論家通過中西習俗、心理等方面的分析，總體地論述了中西小說之異同、優劣等。林紓就說過：“大抵西人為小說，多半叙其風俗，後雜人以事實。風俗者不同者也。因其不同，而加以點染之方，出以運動之法，等一事也，赫然觀聽異矣。”^[13]指出了風俗不同對小說創作的影響。金鬆岑認為：“人之生而具情之根苗，東西洋民族之所同；即情之出而占位置於文學界者，亦東西洋民族之所一致也。以兩社會之隔絕反對，而乃取小說之力，與夫情之一脈。溝而通之。則文學家不能辭其責矣。”^[14]黃人指出：“南海北海，此心同，此理同，小說為以理想整治實事之文學，雖東、西國俗攸殊，而必有相合之點。如希臘神話、阿拉伯夜談之不經，與吾國各種神怪小說，設想正同，蓋因天演程度相等，無足異者。”^[15]除了分析希臘神話與我國神怪小說的共同處外，他還指出《夜叉夫人》與《謀夫奇案》“如出一轍”，《畫靈》與《鮑打滾冥畫》“其術正同”等。曼殊認識到：“泰西之小說，書中之人物常少；中國之小說，書中之人物常多。泰西之小說，所叙者多為一二人之歷史；中國之小說，所叙者多為一種社會之歷史。……蓋吾國之小說多述往事；泰西之小說，多

描寫今人。其文野之分，乃書中材料之範圍，非文學之範圍也。”^[16] 俠人在比較研究中提出在小說創作方面“西洋之所長一，中國之所長三，西洋之所長，終不足以贖其所短；中國之所短，終不足以病其所長”^[17]的看法，從小說的分類、敘事及結構等方面揭示了這些優劣，從而堅定了中國小說作者與讀者的民族自信心，批評了當時在創作、閱讀中的某種崇外心理。這種中西小說的比較論述，在近代小說理論文章中隨處可見。這種方法的使用儘管帶有明顯的幼稚性，但它已經成為近代小說批評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也是近代小說理論迥異於昔日小說理論的一大特色。

總之，近代小說理論中，不管是小說的文學比較研究還是小說的比較文學研究，都大大豐富了晚清小說批評的方法，深化了小說批評的內容。在小說規律的探尋方面，獲得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發現。可以說，比較研究方法在小說批評中的廣泛運用，加速了我國小說理論的近代化進程，促進了我國小說理論的近代化。

歸納起來。我們從批評觀的近代化、批評形式的多樣、專門和初趨體系化、批評理論的更新、比較研究方法的廣泛運用和拓展等幾個方面對晚清小說理論的批評方法進行了考察和論述。盡管晚清小說批評在許多方法的運用上並未達到成熟的地步，可我們從它們所取得的理論成就來看，應該說晚清小說理論在批評方法上已經達到了近代化；而這種方法的近代化正是構成晚清小說理論近代化的一個必要條件。

注釋：

- (1)《漢書·藝文志》
- (2)《少寶山房筆叢》卷二十九丙部“九流緒論下”
- (3)“雜事”：《程事》
- (4)“雜事”：《東南紀事》
- (5)《讀第五才子書法》
- (6)《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
- (7)康德《判斷力批評》(上)商務印書館1965年1版第47頁
- (8)東海覺我《小說林緣起》
- (9)《小說林發刊詞》
- (10)黃摩西《中國文學史》
- (11)管達如《說小說》
- (12)林紓《塊肉餘生叙》
- (13)林紓《紅礁畫漿錄》譯餘剩語
- (14)林紓《洪罕女郎傳》跋語
- (15)金鬆岑《論寫情小說於新社會之關係》
- (16)黃人《小說小話》
- (17)《小說叢話》